



“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
高兴 / 主编

我的疯狂世纪

(第二部)

[捷克] 伊凡·克里玛 / 著

袁观 / 译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Ivan Klima

我的疯狂世纪

(第二部)

Ivan Klima

[捷克] 伊凡·克里玛 / 著

袁观 / 译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我的疯狂世纪. 第2部 / (捷克) 克里玛著 ; 袁观译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6. 4
(蓝色东欧 / 高兴主编. 第2辑)
ISBN 978-7-5360-7894-9

I. ①我… II. ①克… ②袁… III. ①散文集—捷克
—现代 IV. ①I5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058512号

合同版权登记号: 图字 19-2011-086 号

MY CRAZY CENTURY

IVAN KLÍMA

Copyright: © Ivan Klíma

All rights reserved

出版人: 詹秀敏

丛书策划: 肖建国 朱燕玲 孙虹

出版统筹: 李倩倩

责任编辑: 李倩倩 许泽红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凌春梅

装帧设计:  棱角视觉
ANGULAR VISION

书 名 我的疯狂世纪 (第2部)

WO DE FENG KUANG SHI JI (DI ER BU)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恒美印务 (广州) 有限公司

(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市大道南路334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

印 张 10.625 2插页

字 数 280,000字

版 次 2016年4月第1版 2016年4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9.00元

本书中文专有版权归花城出版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eph.com.cn>

记忆，阅读，另一种目光

(总序)

高兴

昆德拉说过：“人的一生注定扎根于前十年中。”我想稍稍修改一下他的说法：“人的一生注定扎根于童年和少年中。”童年和少年确定内心的基调，影响一生的基本走向。

不得不承认，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都有着不同程度的俄罗斯情结和东欧情结。这与我们的成长有关，与我们的童年、少年和青春岁月有关。而那段岁月中，电影，尤其是露天电影又有着怎样重要的影响。那时，少有的几部外国电影便是最最好看的电影，它们大多来自东欧国家，几乎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是我们童年的节日。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它们还是我们的艺术启蒙和人生启蒙，构成童年最温馨、最美好和最结实的部分。

还有电影中的台词和暗号。你怎能忘记那些台词和暗号。它们已成为我们青春的经典。最难忘的是《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空气在颤抖，仿佛天空在燃烧。’‘是啊，暴风雨来了。’”“看，这座城市，它就是瓦尔特。”简直就是诗歌。是我们接触到的最初的诗歌。那么悲壮有力的诗歌。真正有震撼力的诗歌。诗歌，就这样和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紧紧地连接在了一道。

还有那些柔情的诗歌。裴多菲，爱明内斯库，密茨凯维奇。要知道，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读到他们的诗句，绝对会有触电般的感觉。而所有这一切，似乎就浓缩成了几粒种子，在内心深处生根，发芽，成长为东欧情结之树。

然而，时过境迁，我们需要重新打量“东欧”以及“东欧文学”这一概念。严格来说，“东欧”是个政治概念，也是个历史概念。过去，它主要指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七个国家。因此，在当时，“东欧文学”也就是指上述七个国家的文学。这七个国家，加上原先的东德，都曾经是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的成员。

一九八九年底，东欧发生剧变。此后，苏联解体，华沙条约组织解散，捷克和斯洛伐克分离，南斯拉夫各共和国相继独立，所有这些都不断改变着“东欧”这一概念。而实际情况是，波兰、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家甚至都不再愿意被称为东欧国家，它们更愿意被称为中欧或中南欧国家。同样，不少上述国家的作家也竭力抵制和否定这一概念。在他们看来，东欧是个高度政治化、笼统化的概念，对文学定位和评判，不太有利。这是一种微妙的姿态。在这种姿态中，民族自尊心也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但在中国，“东欧”和“东欧文学”这一概念早已深入人心，有广泛的群众和读者基础，有一定的号召力和亲和力。因此，继续使用“东欧”和“东欧文学”这一概念，我觉得无可厚非，有利于研究、译介和推广这些特定国家的文学作品。事实上，欧美一些大学、研究

中心也还在继续使用这一概念。只不过，今日，当我们提到这一概念，涉及的就不仅仅是七个国家，而应该包含更多的国家：立陶宛、摩尔多瓦等独联体国家，还有波黑、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塞尔维亚、黑山等从南斯拉夫联盟独立出来的国家。我们之所以还能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谈论，是因为它们有着太多的共同点：都是欧洲弱小国家，历史上都曾不断遭受侵略、瓜分、吞并和异族统治，都曾把民族复兴当作最高目标，都是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才相继获得独立，或得到统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都走过一段相同或相似的社会主义道路，一九八九年后又相继推翻了共产党政权，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之后，又几乎都把加入北约、进入欧盟当作国家政策的重中之重。这二十年来，发展得都不太顺当，作家和文学都陷入不同程度的困境。用饱经风雨、饱经磨难来形容这些国家，十分恰当。

换一个角度，侵略，瓜分，异族统治，动荡，迁徙，这一切同时也意味着方方面面的影响和交融。甚至可以说，影响和交融，是东欧文化和文学的两个关键词。看一看布拉格吧。生长在布拉格的捷克著名小说家伊凡·克里玛，在谈到自己的城市时，有一种掩饰不住的骄傲：“这是一个神秘的和令人兴奋的城市，有着数十年甚至几个世纪生活在一起的三种文化优异的和富有刺激性的混合，从而创造了一种激发人们创造的空气，即捷克、德国和犹太文化。”^①

克里玛又借用被他称作“说德语的布拉格人”乌兹迪尔的笔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形象的、感性的、有声有色的布拉格。这是一个具有超民族性的神秘的世界。在这里，你很容易成为一个世界主义者。这里有幽静的小巷、热闹的夜总会、露天舞台、剧院和形形色色的小餐馆、小店铺、小咖啡屋和小酒店。还有无数学生社团和文艺沙龙。自然也有五花八门的妓院和赌场。布拉格是敞开的，是包容的，是休闲的，是艺术的，是世俗的，有时还是颓废的。

^① 见伊凡·克里玛《布拉格精神》第44页，崔卫平译，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

布拉格也是一个有着无数伤口的城市。战争、暴力、流亡、占领、起义、颠覆、出卖和解放充满了这个城市的历史。饱经磨难和沧桑，却依然存在，且魅力不减，用克里玛的话说，那是因为它非常结实，有罕见的从灾难中重新恢复的能力，有不屈不挠同时又灵活善变的精神。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布拉格的话，克里玛觉得就是：悖谬。悖谬是布拉格的精神。

或许悖谬恰恰是艺术的福音，是艺术的全部深刻所在。要不然从这里怎会走出如此众多的杰出人物：德沃夏克，雅那切克，斯美塔那，哈谢克，卡夫卡，布洛德，里尔克，塞弗尔特，等等。这一大串的名字就足以让我们对这座中欧古城表示敬意。

布拉格如此，萨拉热窝、华沙、布加勒斯特、克拉科夫、布达佩斯等众多东欧城市，均如此。走进这些城市，你都会看到一道道影响和交融的影子。

在影响和交融中，确立并发出自己的声音，十分重要。不少东欧作家为此做出了开拓性和创造性的贡献。我们不妨将哈谢克和贡布罗维奇当作两个案例，稍加分析。

说到捷克作家哈谢克，我们会想起他的代表作《好兵帅克》。以往，谈论这部作品，人们往往仅仅停留于政治性评价。这不够全面，也容易流于庸俗。《好兵帅克》几乎没有什么中心情节，有的只是一堆零碎的琐事，有的只是帅克闹出的一个又一个的乱子，有的只是幽默和讽刺。可以说，幽默和讽刺是哈谢克的基本语调。正是在幽默和讽刺中，战争变成了一个喜剧大舞台，帅克变成了一个喜剧大明星，一个典型的“反英雄”。看得出，哈谢克在写帅克的时候，并没有考虑什么文学的严肃性。很大程度上，他恰恰要打破文学的严肃性和神圣感。他就想让大家哈哈一笑。至于笑过之后的感悟，那就是读者自己的事情了。这种轻松的姿态反而让他彻底放开了。借用帅克这一人物，哈谢克把皇帝、奥匈帝国、密探、将军、走狗等等统统给骂了。他骂得很过瘾，很解气，很痛快。读者，尤其是捷克读者，读得也很

过瘾，很解气，很痛快。幽默和讽刺于是又变成了一件有力的武器，特别适用于捷克这么一个弱小的民族。哈谢克最大的贡献也正在于此：为捷克民族和捷克文学找到了一种声音，确立了一种传统。

而波兰作家贡布罗维奇与哈谢克不同，恰恰是以反传统而引起世人瞩目的。他坚决主张让文学独立自主。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贡布罗维奇的作品在波兰文坛显得格外怪异离谱，他的文字往往夸张扭曲，人物常常是漫画式的，他们随时都受到外界的侵扰和威胁，内心充满了不安和恐惧，像一群长不大的孩子。作家并不依靠完整故事情节，而是主要通过人物荒诞怪僻的行为，表现社会的混乱、荒谬和丑恶，表现外部世界对人性的影响和摧残，表现人类的无奈和异化以及人际关系的异常和紧张。长篇小说《费尔迪杜凯》就充分体现出了他的艺术个性和创作特色。

捷克的赫拉巴尔、昆德拉、克里玛、霍朗，波兰的米沃什、赫贝特、希姆博尔斯卡，罗马尼亚的埃里亚德、索雷斯库、齐奥朗，匈牙利的凯尔泰斯、艾什特哈兹，塞尔维亚的帕维奇、波帕，阿尔巴尼亚的卡达莱……如此具有独特风格和魅力的当代东欧作家实在是不胜枚举。

某种程度上，东欧曾经高度政治化的现实，以及多灾多难的痛苦经历，恰好为文学和文学家提供了特别的土壤。没有捷克经历，昆德拉不可能成为现在的昆德拉，不可能写出《可笑的爱》《玩笑》《不朽》和《难以承受的存在之轻》这样独特的杰作。没有波兰经历，米沃什也不可能成为我们所熟悉的将道德感同诗意紧密融合的诗歌大师。但另一方面，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语言的局限以及话语权的控制，东欧文学也极易被涂上浓郁的意识形态色彩。应该承认，恰恰是意识形态色彩成全了不少作家的声名。昆德拉如此。卡达莱如此。马内阿如此。赫尔塔·米勒亦如此。我们在阅读和研究这些作家时，需要格外地警惕。过分地强调政治性，有可能会忽略他们的艺术性和丰富性。而过分地强调艺术性，又有可能会看不到他们的政治性和复杂

性。如何客观地、准确地认识和评价他们，同样需要我们的敏感和平衡。

一个美国作家，一个英国作家，或一个法国作家，在写出一部作品时，就已自然而然地拥有了世界各地广大的读者，因而，不管自觉与否，他，或她，很容易获得一种语言和心理上的优越感和骄傲感。这种感觉东欧作家难以体会。有抱负的东欧作家往往会生出一种紧迫感和危机感。他们要用尽全力将弱势转化为优势。昆德拉就反复强调，身处小国，你“要么做一个可怜的、眼光狭窄的人”，要么成为一个广闻博识的“世界性的人”。别无选择，有时，恰恰是最好的选择。因此，东欧作家大多会自觉地“同其他诗人，其他世界，和其他传统相遇”（萨拉蒙语）。昆德拉、米沃什、齐奥朗、贡布罗维奇、赫贝特、卡达莱、萨拉蒙等等东欧作家都最终成为“世界性的人”。

关注东欧文学，我们会发现，不少作家，基本上，都在出走后，都在定居那些发达国家后，才获得一定的国际声誉。贡布罗维奇、昆德拉、齐奥朗、埃里亚德、扎加耶夫斯基、米沃什、马内阿、史沃克莱茨基等等都属于这样的情形。各种各样的原因，让他们选择了出走。生活和写作环境、意识形态原因、文学抱负、机缘等，都有。再说，东欧国家都是小国，读者有限，天地有限。

在走和留之间，这基本上是所有东欧作家都会面临的问题。因此，我们谈论东欧文学，实际上，也就是在谈论两部分东欧文学：海外东欧文学和本土东欧文学。它们缺一不可，已成为一种事实。

在我国，东欧文学译介一直处于某种“非正常状态”。正是由于这种“非正常状态”，在很长一段岁月里，东欧文学被染上了太多的艺术之外的色彩。直至今日，东欧文学还依然更多地让人想到那些红色经典。阿尔巴尼亚的反法西斯电影，捷克作家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保加利亚的革命文学，都是典型的例子。红色经典当然是东欧文学的组成部分，这毫无疑义。我个人阅读某些红色经典作品时，曾深受感动。但需要指出的是，红色经典并不是东欧文学的全

部。若认为红色经典就能代表东欧文学，那实在是种误解和误导，是对东欧文学的狭隘理解和片面认识。因此，用艺术目光重新打量、重新梳理东欧文学已成为一种必须。为了更加客观、全面地翻译和介绍东欧文学，突出东欧文学的艺术性，有必要颠覆一下这一概念。蓝色是流经东欧不少国家的多瑙河的颜色，也是大海和天空的颜色，有广阔和博大的意味。“蓝色东欧”正是旨在让读者看到另一种色彩的东欧文学，看到更加广阔和博大的东欧文学。

二〇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定稿于北京

主编简介：高兴，诗人、翻译家，一九六三年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世界文学》主编。曾以作家、翻译家、外交官和访问学者身份游历过欧美数十个国家。出版过《米兰·昆德拉传》《东欧文学大花园》《布拉格，那蓝雨中的石子路》等专著和随笔集；主编过《二十世纪外国短篇小说编年·美国卷》（上、下册）、《伊凡·克里玛作品系列》（5卷）、《水怎样开始演奏》、《诗歌中的诗歌》、《小说中的小说》（2卷）等大型图书。主要译著有《梵高》《黛西·米勒》《雅克和他的主人》《可笑的爱》《安娜·布兰迪亚娜诗选》《我的初恋》《索雷斯库诗选》《梦幻宫殿》《托马斯·温茨洛瓦诗选》等。

亲历者的启示

(中译本前言)

袁观

接受伊凡·克里玛先生回忆录《我的疯狂世纪》(第二部)的翻译工作,是我人生路上的一个新起点。从这位智慧老人的回忆录中,我学到了很多。书中大量内容来自他的日记,这些珍贵的记录,无论对研究捷克历史,还是对研究作家克里玛本人,都极具价值。

捷克自古就是欧洲最民主的地区之一,言论自由被大多数捷克人看作是人最基本的权利。在本书中,您会看到即使被禁止发表任何作品也仍坚持写作的作家、不管身处怎样的困境也仍密切关注社会问题的知识分子,看到他们在非常时期依旧勇于担当社会的中坚角色。

第一章里有这样一个细节:“这是一个奇怪的时期,文学周刊的两个编辑直接来到内政部,在传达室

进行了自我介绍，并宣称他们需要立刻和部长谈谈，几分钟后，他们已经进入部长宽敞的办公室。”——这样的情景对我们来说是难以想象的，甚至令人难以置信。

了解东欧剧变的历史对我们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在历史的转折点上，不同的处理方式会带来截然不同的结果。作者这样描述一九六八年“布拉格之春”复兴运动中人们的表现：“之前很多人是不情愿参加五一劳动节庆祝活动的。而这次确实公民们自发地走出来，以此来强调自己对国家新的领导班子的信任……人们就像建造国家大剧院时那样，在几个热心人的提议下，给那时出现的共和国基金会汇去自己的积蓄，捐赠自己的戒指和别的首饰。基金会在两周内，仅收到的黄金就达到了四十公斤……在那短暂的八个月里……有很多人在那时甚至有将民主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的梦想……”克里玛所描写的是一场自发的改革，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提出了“带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翻译中我不禁想到，如果苏联和华约成员国没有武力干预，如果这场改革进行下去会怎么样？当然，历史没有重写的机会，一切在八月二十日深夜改变了，苏联领导的华约军队入侵捷克。克里玛冷静详细地记录了这一历史时刻，真实再现了危在旦夕的国家局势，也再现了普通捷克民众，甚至捷克斯洛伐克当局的紧张、无助之感。

在应邀赴美国教授捷克语和捷克文学之后，面对留下还是回国的问題，克里玛义无反顾选择回国，回到捷克人民中间。而此时，捷克已进入了亲苏捷共政府统治时期，被苏联称为“友好帮助”时期，而对于捷克人民来说，这是屈辱的被占领时期。作者以亲历者身份，详细描写和记录了那段经历，用自己的笔为一段特殊时期建立了一份特殊档案。这本回忆录的价值正在于此。

从被占领初期到一九八九年剧变，捷克文化界大多数知识精英始终坚持着非暴力的抵抗和抗争。他们从公开转为地下，即使被禁止发表作品，但还是想方设法用机打手稿的方式让读者看到自己的作品。

在翻译过程中，我遇到了很多困难。克里玛先生知识非常渊博，

人生阅历很丰富，在行文中使用了很多典故，这些典故有的来自捷克的俚语，只有熟悉捷克历史文化的人才会懂。为此我多方查阅资料，并且得到了汉娜·斯坦克娃女士的无私帮助，没有这些帮助这本译稿是难以完成的。我也非常感谢高兴老师能推荐我来翻译这本书，感谢他对新译者的信任和提携。还有朱燕玲老师和孙虹老师的支持。感恩！

于北京

2015 年 10 月 27 日

第一章

一九六七年夏天，他们驱散了作家联盟领导层，解雇了我们所有《文学报》编辑，不久之后事情便发生了。我和某个德国记者在作家俱乐部见面（记者总是对周围发生的丑闻最感兴趣）。他想知道，我们是否在作家代表大会前就被事先沟通过了，我是否担心自己会被送上法庭，或者担心他们有可能将禁止我发表作品。我的回答可能让他吃惊，我说我没有想过自己是否会被逮捕，也不会徒劳地去找任何别的工作。他说，他希望也能有像我一样对生活乐观的态度。我们在国家大剧院前面的拐角处告别。我不知道忽然想起了什么，回头一看，发现某个穿牛仔裤配格子衬衫的家伙好像试图迅速地躲到剧院入口的柱子后面。

为了证实我的猜测，我沿着河堤走向不久前还为之工作的编辑部。过了一会儿，我停下来回头看，那人就在街对面人行道上，隔着一定距离也停了下来，装模作样地拿出照相机，开始拍摄城堡区全景。

我被自己的好奇心征服，于是开始漫无目的地沿着老城区的街道游荡。过了一会儿，那人消失了，但我几乎可以肯定，这次是一个穿短袖衬衫的男人接替了他。

我还从来没被跟踪过，至少我之前从来没有觉察过。不管我对生活持如何乐观的态度，我还是不得不承认，我显然处于一个不同于以往的处境中。估计我被列入犯罪嫌疑人即社会主义敌人的类别中了，所以才被跟踪。

《文学报》还在继续出版，只是报纸的定位改变了。新的编辑都

来自军队新闻界和共产党机关，就像后来被苏联占领后出现的情况类似，这些人大多数都获得了至少二十年的铁饭碗。

扬·泽伦卡成了新编辑部的头儿。在他的领导下，编辑部努力争取作家们的供稿，但大多数同事拒绝给被接管的报纸写东西。作家们的心情在我们的同事米兰·昆德拉给泽伦卡的信里表露无遗。

泽伦卡同志：

不久前你在大街上拦住我，然后我们谈了大约三分钟。我现在得知，你在法律、哲学和新闻学院学生大会之前援引了这次谈话，并用教名亲密地称呼我（虽然我们在生活中只说过两次话），你说我对自己的观点很后悔，不管是我在作家代表大会上形成的观点还是在别的地方形成的观点，我现在正走在检讨自己改正错误的“正道”上，等等。

我不追究你给我臆想出的这个自我批评，但为了杜绝这种事情，我必须向你宣布，对于我在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我认为没有什么要改变的，我以前不同意你们对《文学报》的干预，现在还是不同意（我对此已经公开说了），你在这件事上所扮演的角色使我觉得很悲哀，你的表现是很滑稽可笑的……

大多数作家都抵制泽伦卡的“公家财产”——他们现在是如此称呼这份报纸的；与此同时，一些至今未被接管的杂志跟我们这些被解雇的编辑约稿。

从战争结束，事实上，从共和国建立之后，社会已经开始分裂——现在分界线好像移动了，社会上已经不是分为民主党支持者和革命专政支持者，不是分为共产党人和非共产党人，而是分为只追求权力的人和追求更自由地思考和行动的人。

我失业了，但我无法想象自己不写作的生活，于是开始写短篇小说。我不确定是否有人会发表它，但我不会被为时尚早的问题困扰。我打算讲一个关于虚假领袖的寓言故事。我塑造了一个平庸官员做小说的主人公，并给了他一个使徒的名字：雅各布。我的主人公从儿时就开始做英雄梦。他感到现有的生活只是充满挫折经验的虚假存在，但他做到了我难以做到的事情：和自己的妻子及朋友们一起去国外荒凉的山区旅行（我写作时脑中想象的是苏格兰的景色），而爬上山在他的心中意味着虚假和真实的象征性转折。

我的主人公是穿着他借来的牧师长袍上的山（在旅途中他们遇到了大雨，全都被淋透了，他们在一个教区找到避雨处，一位教区教士将自己的旧长袍送给雅各布）。接着他们所有人一起出发去海港，因为这个海港有船定期提供短途海运，他们想从那里乘船继续自己的旅程。

越来越多的人在码头等待着，但小汽轮没有来，因为码头刚推出一个新的时刻表。幸运的是，一条侧舷亮着凯旋门标志的船向码头驶近。这条船的名字为：希望。它在港口停泊，让所有想上船的人上船，大副甚至隆重地欢迎大家，并邀请他们参加盛宴。

但这本该无忧无虑的航行变成了令人费解的绑架。当轮船驶向海洋深处后，原本表现得很好客的船员们，开始对乘客的所有询问充耳不闻。这些人都被身着教士长袍的雅各布蒙蔽了，纷纷推选他作为大家的发言人。雅各布接受了自己的新使命，他从中看到自己很久前做伟人的梦想终于实现了，他没意识到，假的就是假的，他只是一个假牧师。他满足于船员敷衍他的托词。于是，这奇怪的航行继续着，人们徒劳地争论着船长的目的，船员们要求他们遵守纪律，任何抵抗的行为都被严厉惩罚。他们拒绝接受贿赂，只对雅各布表现出礼貌的尊

重。渐渐地，假牧师成为了绑匪的盟友而不是被绑架者的发言人。最终，他得到船长的接纳，但这个奇怪的老船长并没怎么理睬他，只是自顾自地继续谈论这艘船的使命。他想用这艘船带来希望。他列举自己为此而做的事情，但这些事情总是不顺利，总是被破坏。他对外宣布船将驶到波特兰，在那里有一大群亲戚和陌生的赞助者期待着四十个孩子的到来，但在途中“希望”号被鱼雷艇截住了，孩子们必须在刺刀威胁下登上鱼雷艇，它将把他们带到一个可能杀死他们，但没有任何人会说一句反对的话的国家。随后，轮船装载着货物继续航行，那些货物是给挨饿的人的罐头。尽管被警告，宗教狂热分子们还是摧毁了货物和船。许多人怪船长顽固，但他还能怎么办呢？即使希望总是一再破灭，即使他只剩下对自己的承诺和对命令的忠诚。

我试图通过船长的嘴说出来的是：在我们的世界里，每一个人想象得出的犯罪都成功了，“希望”变成了它自己的对立物。

最后，船长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并将船摧毁。他将船驶向预定的地点，在那儿，他想将船和所有据他说是自愿随船出发的人一起沉入海底。他作为船长当然会留在船上，但船员们将坐救生艇离开“希望”号。小艇上还余出两个空位，如果有乘客拒绝接受“希望”号的命运，可以登上小艇离开。

假牧师的悲剧角色即将结束了。雅各布决定将其中一个空位留给自己，于是，还剩下一个空位可以由他安排。这突然而至的权力使他迷惑了，他在心里飞快地盘算着：该选择哪一个作为自己的同伴呢？是自己的妻子，还是自己喜欢的朋友的妻子？

一旦一个人接受了假象，只能在梦里才看清本我时，他就无法果断地做决定。雅各布用尽剩下的所有时间去思量，结果他谁也没有选中，甚至还在船上迷了路。最终，连他自己都没来得及跳上小艇，船员们划着留有两个空位的小艇离开了大船。与此同时，乘客们终于摆脱了自己的假领袖和水手们（这些人之前一直阻止他们进行任何行动），急忙放下另一艘救生艇。雅各布还是可以加入他们的，但他失